

回溯“总理遗言案”：

# 11人受牵连入狱 被先后平反

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蚩蚩儿家聚会时，蚩蚩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很多年以后，蚩蚩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瓜子、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是在两天之后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一个多月后参加《浙江文艺》召开的笔会，我还把它背给了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小林也把它记录下来。为此，后来追查“总理遗言”制造者时，李小林还受到了传讯。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很短的时间内，这份出自一个23岁小工人之手的“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时间里像滚雪球一样传遍了整个中国，很快全世界130多家广播电台和通讯社开始24小时滚动式播放“总理遗言”。

## 受“总理遗言”案 直接牵连入狱11人

几乎所有看到“总理遗言”的人都毫不犹豫地相信其真实性，因为“遗言”中的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许多人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还有那句“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无以言说的悲愤情绪和隐隐期盼，都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蚩蚩儿先将伪造的“总理遗言”传给身边好友这种极端幼稚的做法，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蚩蚩儿就被公安局囊入网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然而，案情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蚩蚩儿的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整天用100支光的电灯照着蚩蚩儿的脑袋，有

好几拨人轮流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终于，蚩蚩儿说出了那一帮“狗肉聚会”的哥们的名字。那次“狗肉聚会”被公安部定性为“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聚会”。很快，先是瓜子在上海被抓，接下来，阿斗、晨光、大耳朵以及他们的部分家人悉数入狱，许多人的命运被从此改变。

蚩蚩儿和所有受“总理遗言”案牵连的11个当事人分别被关押在北京和浙江西天目山、粉碎“四人帮”以后，其他当事人都被放出来，并被先后平反，只有蚩蚩儿和我哥哥瓜子作为此案的核心案犯又被继续关押了大半年。因为公安部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袋蚩蚩儿的笔。

## “总理遗言”的匕首意义

如今再去琢磨公安部门当时因何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但我哥哥瓜子和李君旭出狱后最终因此案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我哥哥瓜子最后由中共浙江省委和公安部先后下文彻底平反，但蚩蚩儿最终拿到手里的却是《公安部关于李君旭同志的复查结论》。红头文件上的标题对我哥哥是“平反决定”，对蚩蚩儿则是“复查结论”。“复查结论”中虽然肯定了蚩蚩儿“是积极反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同时也指出“其做法是错误的”。“总理遗言”在那个历史时期起到的像一把投向四人帮匕首的作用，正式的文件中是不会提的，那样的社会意义只能留在老百姓心里。

我在拙著《重返1976》中对于蚩蚩儿、瓜子，包括其他当事人因此案身体受损曾经有过非常详细的描写。蚩蚩儿逝世后，《文学报》就此书对我做了一个专访，记者直截了当地问我：书里充满了种种玄机。比如，你书中提到的蚩蚩儿和瓜子之间的很多奇妙的重合，还有瓜子大病初愈，救他性命的沈医生却跳楼身亡。发生在生活中的这些玄机，总让人发出命运无常的慨叹。你对命运一说持何种见解？我当时的回答是：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走进知天命的年轮，大概可以对命运说点见解了。我从来都以为这个世界背后有许多看不见的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因为我们看不见或者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了。这种东西是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联的，它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是一条长河，人是长河上漂荡的一只小船。长河流向哪里，天地间有着一定之规。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要走向死亡，每一个生命的尽头都是一座寂寞的坟墓。

## 蚩蚩儿、瓜子后来的命运

蚩蚩儿和瓜子是前后脚发病的。瓜子先被查出得了肝炎，在家隔离休养了两个多月，觉得自己症状基本消失，差不多痊愈时，他首先想到去看蚩蚩儿。那是在1989年夏天，夏



“总理遗言”案主要当事人中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左四，蚩蚩儿；左六，瓜子)

时制实行的第一天。正是这一天，蚩蚩儿在家中突然发病，口吐鲜血躺在地上；正好去看他的瓜子见状赶紧背起人高马大的蚩蚩儿，将他送到医院抢救。自己得肝炎还在休养的瓜子背着200多斤的蚩蚩儿跑上跑下，抢救时他又一直守在门外，等蚩蚩儿做完开颅手术抢救回来时，瓜子只觉得两腿一软，虚脱了一般。低头一看，两腿肿得像透明的棒槌，做了生化全套，指标很吓人，结论更残酷：肝肾综合征。医生说，我哥哥瓜子得了肝炎，本身就是一张薄纸，一绷，破了。肝肾综合征，几乎可以说是不治绝症。

蚩蚩儿住的浙二医院和瓜子住的浙一医院中间隔了一条河，但却没有隔断彼此。两条逃脱牢狱的年轻生命又因为疾病再次纠缠在一起。瓜子这场病一生就是六年，其间生生死死，三次病危。瓜子很坚强，几次重大的、逆转性的冒险治疗全部自己作出决定，最终起死回生，至今仍活跃在工作岗位上。而蚩蚩儿手术后基本卧床，脑子清一阵，糊一阵，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关于这一切的种种人生故事我在《重返1976》这本书里已经写得很详尽，在此我不想再赘述细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我对《文学报》记者提问的回答，是自己心中真实的所想，但我知道，我心中其实还有另一个答案，天地间确实有许多未解的玄机，蚩蚩儿和瓜子之间有许多奇妙的重合，但命运的缰绳有一个头还是拽在自己手里的。生活很多元，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遗体告别仪式后，所有“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不约而同地都没有离开，大家都想再送蚩蚩儿最后一程。在遗体火化室外排队等候了很长时间，天空一直凄凉地下着潇潇冷雨。有人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J(蚩蚩儿的

前女友，她的人生命运曾因蚩蚩儿和“总理遗言”而彻底改变，她和蚩蚩儿的爱情故事恐怕是《重返1976》中最柔软和浪漫，同时也是最凄凉的一章，她来了吗？马上有人回答，来了，告别仪式后就悄悄走了。

又有人说，看到蚩蚩儿前妻送的花圈了，没有放在醒目的位置，而是混在众多友人送的花圈中(蚩蚩儿的前妻优雅、美丽，我相信她的人生也有很多无奈)，而我没有说出来的是，我看到了发短信问我追悼会具体时间的那位前省委宣传部领导送的花圈，一看就是专门定制的，是用很少见的一种白色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不大，但挽联上的悼词让人心酸落泪。

我知道，一段历史从此彻底结束了。一个小人物作出过的大事情，即便曾经撼动过中国，影响过一代人，但当你化作一缕青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时，有谁还会记得呢？

走出火化室时，冷雨中站着一个人留着披肩发戴眼镜的女孩子，她手里拿着一本《重返1976》问我，你是袁敏吗？我说是。她说，能给我签个名吗？我问她你怎么会看这样的书？我以为20多岁的年轻人不会对那段遥远陌生的历史感兴趣。女孩子告诉我，她是南京财经大学的学生，《重返1976》这本书，她看了好几遍，每次看都要落泪。她早就想来看蚩蚩儿了，觉得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活得太丰富太精彩了，与他们相比，她活得太苍白了。从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直后悔自己没有早点来，为了赶上见蚩蚩儿最后一面，她前一天就坐长途汽车赶来了。

我在女孩儿的书上签了名，心里有一丝安慰，我想告诉蚩蚩儿，除了物欲、拜金、娱乐等等之外，今天还有这样的年轻人为你当年的热血而来。(据《北京晚报》)



## 毛泽东在北京饭店：主动出示身份证 尊重服务人员

北京饭店已逝的一些老师傅们曾经告诉过我，他们最怀念的还是已拆掉的五层红砖老楼，为什么呢？因为北京饭店老的红砖五层楼房，也是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会场之一。

先师叫杨德修，是解放前就在北京饭店当客房服务员的。老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跟我说：“1949年6月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席请来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建国大计的民主人士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史良、鲁迅夫人许广平等130多名代表，就全部住宿在我们北京饭店。一天，我正在红砖老楼的东礼堂，手中端着茶壶，依次给参加会议的130多名代表们斟茶水，忽见很多代表们都从座椅上站了起来，鼓掌响起一片，我抬起头一看，就见到东礼堂画像上的毛主席突然变成了真人，我见到毛主席招着手，还时不时地也双手鼓掌，向开会的

代表们走来。我看到毛主席穿着很朴素，也像大会的其他代表一样，左胸上衣口袋处，佩戴有一枚长方形的红绸条，上面写着‘代表’两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真人，也是毛主席头一次来到我们北京饭店。”

当年，北京饭店的另一名已逝老司机王恩和师傅，也曾跟我说：“1949年6月11日，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咱店里仅有的3名司机之一，正在老楼门口和驻店军代表王卓如一块待命，我开的小汽车就停在大门口处不熄火，有接送首长的任务时就马上出发。那一天，我亲眼见到，毛主席下了小汽车，在咱北京饭店办公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站在大门口外迎接毛主席的到来，在杨尚昆的陪同下，毛主席健步走向老楼的大门口，毛主席用手举着自己的身份证件，他很主动地向门卫出示，让他们看清楚。他还向我们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战士们亲切地招手致意。在旧社会，我们‘店小二’是最低人一等的下九流，常受到住店军阀、有钱人的打骂。今天解放了，就连毛主席都尊重我们服务人员，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老餐厅服务员、曾招过班禅的任仲英老人，在1978年也曾经跟我说过：“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在1946年2月。这应该他第一次来到北京饭店，与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签订‘停战协定’。2月底，也

就是28日晚上6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西餐厅举行鸡尾酒会，那一天，周恩来同志精神焕发，穿着蒋介石给他颁发的上将戎装，与中外记者、国共两党和谈代表和各界人士200多人谈笑风生，相互敬酒，庆祝签订‘停战协定’，周恩来以他个人的儒雅气质和平易近人的真诚态度，征服了鸡尾酒会上的200多名与会者。”

北京饭店的另一名已逝者、解放战争时杨得志司令员的警卫员、北京饭店的老保卫科长周树清也说：“在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周恩来总理到北京饭店参加会议，当周总理的专车将要开到饭店大门口时，也有一辆人大代表的车要在大门前停下，饭店警卫队的人员就示意，要这辆车马上开走，周总理从车上下来后，严肃批评了他熟悉的这位饭店警卫人员：‘你快点把这位代表请回来，人家是大会代表，我也是大会代表嘛，级别一样嘛！’周总理站在饭店大门口，等到这位人大代表的车又开回来，那位代表下车后，周总理主动地走上前去和他握了握手，又伸出手请他先进了饭店大门后，自己才进入北京饭店。”这情景，令周树清等在场人员无不受感动。

以上这两则毛主席、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小故事，是我在40多年以前，亲耳聆听北京饭店前辈们所讲，印象特别深刻，谨记之，以传历史。(据《人民政协报》彭晓东)